

第五章 結 論

綜合前述各章，包括適用於中國大陸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研究的後殖民理論，民族主義類型論和愛國主義教育的背景，以及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之探討，試就研析所得，依據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問題和本論文的研究旨趣，針對愛國主義教育理論難題的省思，作為本研究的結語，並就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轉型提出展望。

第一節 省思——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

從本研究可以看出，作為中共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危機下的產物。民族主義雖然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現代化等層面上，有不同的意涵與表現，但是就中共政權而言其共同的特徵殆為民族國家認同的危機。中共曾先後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公式，作為它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指導思想，而從中共建政五十多年的經驗來看，如何找到一條凝聚全民對民族國家建設的發展道路，以達到現代化與民主化，還是遙遙無期；究其原因，是社會主義仍然提不出一套適合當代中國特殊環境的主張，而中共民族國家認同的根本危機即肇因於此。本節乃在後殖民論述下，先總結前述有關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問題之研究，提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難題之所在，再進一步去反思中國大陸合宜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基礎。

壹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擺脫階級民族主義的束縛

就後殖民理論的角度而言，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兩個意義：（一）它可以視為一種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歷程，毛反對不加思索地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承襲啟蒙現代性的「東方主義」套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中來；（二）它突顯出做為民族主義者的本位立場，毛反對古典馬克思主義那種以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落後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來看待中國革命，反倒是積極強調其落後優勢的觀念。而在實踐上，蘇聯

在馬克思主義東傳過程中，取得文化與政治意識型態的霸權，且透過反資本主義陣營的建構，形塑了這個陣營中的主從結構，導致蘇聯中心主義的出現，與在如何邁向成熟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此一向度上形成特殊形式的「東方主義」。因此，在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共一方面既要抗拒西方中心主義，另一方面又要挑戰蘇聯中心主義¹，說到底這是傳統的「中國中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或「華夏中心主義」的另一種極左的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

我們要知道，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中隱含華夏中心主義的成素。用馬列主義來做為國家認同，即是意識型態的認同；而意識型態的認同通常還包含著對由意識型態推出的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的認同。這樣，當意識型態及其所推崇的制度被視為「世界第一」之時，那就會使得開放的現代民族主義向類似傳統的華夏中心主義回歸。中國能否成為意識型態所主張的全人類理想社會的代表，本是形成傳統華夏中心主義的關鍵因素。中共把馬列的共產主義當作全人類的普遍理想，落後的中國也可以通過建立最先進的理想社會而成為人類價值之體現，換言之，中國有可能再次成為新世界秩序的中心。因此，只要條件具備了，這種階級民族主義支配下的國家認同，就會變成一種類似於傳統華夏中心主義的結構，金觀濤將其稱為「新華夏中心主義」。

新華夏中心主義雖然存在於中共政權的意識型態中，但在一九六〇年代中蘇決裂之前，中國還沒有成為意識型態規定的人類理想社會的代表。直到一九六二年中蘇關係破裂之後，毛澤東思想已成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而作為體現毛澤東思想這一新天道的中國，自然立即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文革發生時林彪又把毛澤東思想中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推廣到全世界，提出以中國為首的第三世界是世界的農村，它正在進行包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這些世界城市的鬥爭。這時潛在的華夏中心主義急驟膨脹，終於在文革中成為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主導形式。新華夏中心主義和傳統華夏中心主義一樣，以對某種普遍主義的制度文化的忠誠代替對國家民族的忠誠，這

¹ 溫洽溢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五個向度議題上是與蘇聯革命模式站在對立面，包括：(一) 中國化的軍事策略；(二) 對奪權手段的重新理解；(三) 對資產階級革命形式的重新認識；(四) 建構一種屬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新的國家形式；(五) 重新賦予黨的角色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意義。而這五個面向一起構成了毛主義意識型態的基本核心要素。直到中共建政之後，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毛澤東才表現出與蘇聯模式即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策略的決裂，這時毛澤東才徹底打破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界限，毛澤東的思想體系於焉建構完成。但毛澤東始終也沒有打破他對重工業的需要，他只是反對蘇聯而已。請參見溫洽溢，「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亞季刊，第28卷，第2期(民國86年4月)，頁203。

時捍衛意識型態的純潔勢必導致前所未有的排外；而這種「排外」還包含著把上述的理想制度文化推廣到全世界。今天我們分析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和大規模群眾示威，幾乎都可以看到此雙面的性質：一方面是反一切不同於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另一方面是把毛澤東思想推廣到全世界。不過，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人們發現中國落後於西方，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讓中國對外開放，新華夏中心主義衰落；中國再次回到國家主權和文化認同的愛國主義教育中來。

事實上，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大陸被迫必須結束與西方國家的敵對狀態，才能重建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有機關係。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共讓中國大陸從東南沿海開始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開放，並全面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中。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成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維持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有著密切關係。不過，中共在讓中國大陸重新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也不斷強調走自己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力求在開放中仍堅持其政治意識型態的原則，將西方與親西方的中國人打成一個對立面的「他者」，一個不是以「中國」為主體出發的「他者」；另一方面透過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的階級民族主義途徑，來防止「中國」又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制約。而在這種既要重新進入全球資本主義、又要防止西方中心主義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正在走一條後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原本是替後毛澤東時期找出路，但中共卻把它說成為如此才能維繫人類未來之前途，再度陷入了某種形式的東方論述之中。

不過，中共所謂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便是標誌著後殖民意識的覺醒。對中共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訴求的背後隱含的意義是：其一，中國不可能與資本主義「脫勾」而走純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二，中共必須以資本主義為中介，才能成就、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在中共的邏輯裡已不是用二元對立的方式來看待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而將兩者視為是一種相互依存的辯證關係。當中共認識到此點時，在經濟上便已擺脫了「受殖」、且有了「解殖」意識的存在；然而在文化、政治方面，中共仍陷於「殖民」的陰影中，尚未擺脫「受殖」的意識；我們可以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經政策中得知。今天，中共因應改革開放政策的現實需要，既已跨越教條化的馬列主義毛思想，而為了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並能體現中國的現代化，中共就必須更進一步跨越對馬列主義毛思想形式主義的堅持，在培養中國人的批判反思能力以及

建立中國人自覺的批判反思機制的情況下，根本不需要高舉馬列主義毛思想的旗幟，就可以讓中國和世界接軌，與世界形成辯證的有機結合關係。

總的來說，中共的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主要是在毛澤東時期建立起來的。而毛澤東的階級民族主義有兩大缺陷：一是具有強烈的反西方、排外的情緒化傾向，這表現在國際「反帝」的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的衝動上；另一個致命缺陷是在於其內容空洞化，民族主義的情緒化特徵使得其從根本上無法提供關於國家的建設性的意見和問題解決辦法，它過分強調國家本位，以國家作為一個不加劃分的利益主體，而構成國家的最基本單位——個人，卻沒有得到考慮。在鄧小平時期，中共雖然將其國家的重心全面轉向經濟建設和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一政策重心的轉移並不意味著民族主義的衰退，而是民族主義的變形，亦即由階級民族主義向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傾斜；但是這種帶有「華夏中心意識」和「義和團情緒」的階級民族主義從來都沒有被清算過，相反，卻以種種不同的方式被保存下來，一則「和平演變」若被建構為「真實的想像」，一則「中國威脅論」被過度炒作，那麼這種潛藏的情緒仍有可能隨時被引爆開來。所以，中共真要想建立中國大陸合宜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話，首先就必須擺脫階級民族主義這種盲目反帝、排外、反西方的浪潮，再進而將現在的國家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轉型至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貳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正視國家民族主義的局限

如果我們把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放在「啟蒙與救亡」的二元架構之下，就會發現中國現代化的難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民族救亡和思想文化的啟蒙之間的衝突和不協調發展來理解，這樣對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意涵就更清楚了。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一直存在著錯位現象，民族主義過分強調本國家、本民族，批評西方文化和制度，就極易從反對西方的價值理念，到反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拒絕和批評自由主義；中共所謂「抽象的自由」、「資產階級虛偽的自由」、「精神污染」等說法，都是要表明，所有對國家、對民族最壞、最危險的東西都是自由主義這一敵人。這樣，中共民族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排拒和抑制的可悲情景，就習以為常的被延續著。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不能同時並存或互動，主要原因是在於中共對愛國主義教育的誤解。中共要建立穩定的政治制度，不僅是靠愛國主義，而更要施行「憲政」，建立

憲法最高的法律地位；目前施行「憲政」最大的問題是黨的地位。由於中共認為，作為代表社會的黨可以領導國家，所以造成黨的地位高於國家，國家的憲法不是國家的最高法律。是故，中共用「愛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這種方式來詮釋愛國主義，不但是對愛國主義教育的扭曲，同時也使得國家民族主義往不完全的、偏離憲政民主的方向發展。

既然如此，中共便無法合理的重建民族主義，從而使得中共迄今仍然無法形成一套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主要成為替統治者的權威、國家主義或以民粹主義進行動員的手段，這就相對的會強調國家重於社會、集體先於個人的優位性，其結果很容易是國家主權或集體主義的訴求被無限上綱，從而使人民或民主主權受到相對的漠視或甚至否定，個人人權被認為必須從屬於以民族國家主權為主體的價值體系之下；同時，中共以「社會主義為體、資本主義為用」的體用論架構為基礎，民族主義的訴求很容易轉變為極權專制主義，從而壓制政治競爭的機制，不允許民主公共討論領域的真正存在（黃寬裕，民 89：93）。要知道，解決國家和社會關係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現人民或民主主權²。人民或民主主權的重要意義是：首先，對人民來說，它是通過各種方式的參與來制約政府的權力，防止政府濫用權力，讓政府的決策盡量有民主的成分；其次，在今日中國大陸，它的第二層意義更為重大，即以人民或民主主權來加強和強化國家統治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從近代民族主義的歷史演變來看，其核心問題至今一直是民族國家的主權問題，對內表現為如何處理政府、社會、個人之間的關係，對外表現為國家之間的主權關係。在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是民族主權和人民主權兩種主權互動的產物。沒有民主就很難談得上現代民族國家，當然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也就無法建構成功，這是因為民主是現代性的重要條件。然而，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傳播過程中，上述兩種主權被分離開來，民族主權漸漸占據主導地位，人民主權變成國家主權，民主主義演變成了國家主義；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組織而非民主成了現代性的必要條件。但這種轉型並非某些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決定於中國的後發展地位（鄭永年，1998：143-144）。就目前

² 有學者主張以「民主主權」(democratic sovereignty)來取代傳統的「人民主權」概念，並以此項概念涵蓋主權在國家內部和外部的雙重關係與特性。「民主主權」主要指涉民主制度在國家政治結構中，程序上與實質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亦即主權不僅應該歸屬於人民，而更強調民主統治的合法性。請參見楊永明，「民主主權：政治理論中主權概念之演變與主權理論新取向」，政治科學論叢，第7期(民國85年5月)，頁125-156。

中共而言，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應當強調三種主權的建設，即民族主權、國家主權和人民或民主主權。民族主權強調的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追求國家利益；國家主權表明中國的發展與國際和平，必須以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為目標；人民或民主主權強調建立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民主公共領域制度化關係，使中國成為一個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或公民式民族主義的國家。

今日，中共基於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的需要，特重於「經濟理性」的國家民族主義，甚至在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又大力強調文化民族主義，殊不知在運作良好的民主國家中，公民的愛國心乃根源於其對憲政結構合理性的了解及由之產生的認同感。因此，中共這種僅靠經濟合理性來取得統治正當性，卻漠視了政治合理性的憲政民主的制度認同；它只能說是一種不具完整意義的國家民族主義或政治民族主義，自然也就無法建立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再則，中共這種朝自我東方化的民族主義，除了強調國家民族主義的訴求外，還高舉本土化、文化復興的文化民族主義旗幟，如此很容易走向文化本質主義，即用華夏中心主義大論述去對抗西方中心主義大論述；而這種自我東方化的官方民族主義，也很容易變成壓制中國大陸社會多元化的意見，以避免有向國家機器挑戰的機會。此外，中共也從一種後殖民論述的角度去批判西方的民主、人權概念，即認為西方的民主、人權是以西方的東方論述做支撐，中國不處於西方殖民主義宰制中，中國自己有一套符合中國特色的民主、人權標準。換言之，中共藉由這一論述，希望為自己在後社會主義時代的領導奠定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從文化民族主義論述的角度來看，中共迄今仍然沒有建立或接受一種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首先，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及其文化價值觀念的挑戰，中共現階段都會高舉中華文化復興的大旗；而在這面大旗的背後，是中國古老的文化主義帝國的復辟，主要是透過肯定代表儒家精神的「亞洲價值」論，以及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凸顯中國大陸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獨特性與不可替代性。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訴求，使得中共傾向於突出西方力量對中國的滲透和宰制，從而不願在形式上承認國際體系中的民族國家是對等的，也不承認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是在對等的基礎上進行辯證的相互滲透，而是一種宰制和被宰制的關係。其次，中共的重新肯定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其意義與其說是意識型態的重建，毋寧是意識型態的自我否定。更何況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根本是一套對立的東西。再次，「三個代表」

思想的提出，其代表的意義是，中共走不出「受殖」的恐懼感，因為它依然是以「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為主體，而不是中國人民所希望的「真正的中國」為主體。它充其量只是為了給中共的各種現實政策提供一種合法性，並非表示中共要提供一種理論去引導現實的發展。

所以，我們要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唯一可以維持文化多元化，給少數民族文化以自由競爭的空間，而又不使其過分凸顯個性從而陷入衝突的制度安排，其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而就今日中共的文化民族主義來說，其片面側重以文化認同為基本構成原則的民族主義，即有可能是抑扼自由、民主這些普遍主義價值的因素；職是之故，中共對於這種因缺乏反省、批判聲音而帶來過度膨脹的階級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實有必要自覺加以控制。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所謂「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筆者認為符合全球化的時代要求：它承認普遍性的民主價值，且透過訓政、憲政的漸進改革來實現；當然，它免不了也有文化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的特殊環節，不過並不執著於此一環節。總之，孫中山能夠將「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包括民生主義）並舉，乃是因為他有前瞻性的眼光，把「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相結合，所以他所創導的民族主義，可說是一種公民式民族主義或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它也正是中國百多年來所追求的現代性；簡言之，「孫中山式的民族主義」才是建立中國大陸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最佳的出路。

參 愛國主義教育必須迎向後民族主義的挑戰

毫無疑問的，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紀元，許多傳統的觀念被顛覆與解構，許多新時代的理念與思想正不斷地萌芽，而我們，正處身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上，能夠跳出傳統束縛來重新看待這個世界的人，才能夠真正掌握世界的未來。很多人都同意，全球化以及地方與全球的直接聯繫可能，不僅削弱了民族國家的力量、使認同複雜化，同時也造成民族國家的疆界毀壞。一方面，跨國社會空間的形成，使民族國家無法再表徵個人生命史的固定居留地；跨國族群空間的形成，使民族國家無法再清楚地代表某一民族；而跨國文化的興盛，使民族國家不再是文化的主要負載單位和區分界線。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使跨國企業公司、跨國非政府組織越來越強勢，傳統的民族國家功能則相對式微，引發了一連串的重大問題（孫治本，2001：1-2）。因此，在全

球化時代，建立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不僅僅是將傳統民族主義提升至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同時更須進一步轉向後民族主義。而後民族主義肯定每個人在全球化時代都需具有全球意識以及成為國家和世界社會基本成員的能力，相信透過憲政愛國主義教育的歷程，可以使得每一個未來國家和世界公民都準備好，有能力參與公共生活，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的意義之所在。

今天，由於科技突飛猛進，特別是資訊革命，世界已成為一個「地球村」，而經濟活動的結構性，通過跨國公司等機制，資本主義已越來越超越國界，已越來越構成一世界性的體系。不錯，在同一歐洲，西歐各國正和東歐國家努力於建立一超國家的經濟聯邦，甚至一超國家的政治聯合體。無疑的，這是一種建立超國界社會的「後民族主義企圖」的新表現。因此我們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才有出現的可能；可以說，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乃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然而，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是因為在資訊化、全球化時代，民族認同正逐漸地被「多元認同」所取代³，認同的議題不再是可以由國家機器單一方面來形塑或掌控的，國家認同的重要性也在多元認同中逐漸降低。所以，「傳統民族國家的概念不再被視為組成國家的前提，而民族認同也在後現代思維下被當成是一種建構，民族與國家的觀念都在逐漸被轉變當中，認同的內涵自然也隨之轉變」（李英明，2002：133）。尤其在全球治理的格局下，國家已不再成為唯一主導認同的操作者，在不斷發展的多元主體的互動過程中，多元認同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換言之，對每個人而言，以特定國家為中心的公民認同，不再是最為緊要了，反而是多重忠誠和認同已經逐漸地普遍化。

全球化促使「後民族國家」的時代來臨，而針對全球化及民族國家的式微，貝克提出了「跨國國家模式」。此一模式一方面肯定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一方面要用跨國政治力量轉變全球化的無秩序狀態。貝克的主張，不是要放棄國家架構，而是要予以

³ 前蘇聯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是透過國家民族主義作為其發展的道路，試圖要求內部各民族能跨越種族的差異，效忠蘇聯以建立大一統的民族；但事實上這種國家民族主義還是無法做到此點。因為民族雖然可以被想像、創造與建構，但卻不一定能讓人相信而產生預期的效果。此外，當前蘇聯面臨崩潰、瓦解的階段，各民族仍是以民族主義作為訴求，號召各民族脫離蘇聯，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值得注意的，這裡所指的民族主義的訴求，已經不再是以建立一個大一統的民族國家為目的的古典的民族主義了。蘇聯解體之後，各民族間的民族主義，是以人本、個體的角度出發，其目的不是要建立民族認同，而是為了回歸到個人的認同，對過去民族間歷史、宗教、族群以及所屬的家族間的認同，這種訴求正好與全球化制約下所產生的多元認同的方向不謀而合。以上請參見李英明，重構兩岸與世界圖像（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頁131-132。

轉型，其目的並非為了維護傳統上所謂的國家主權，而是因為全球化引起的問題，有賴國家間的合作來規範和解決。在國家功能式微的全球化時代，個別國家各自採行對策必然徒勞無功，只會摧毀國家政治，唯有跨國合作才能延續國家政治的意義。因此，貝克反對民族國家孤立地以保護主義來對抗全球化浪潮。然而，人類因此就該建立起一種大一統的「世界國家」，以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脫序問題嗎？這也是貝克所反對的，因為世界國家的建立意味著可怕的全球權力集中時代的來臨。貝克主張的模式是跨國國家，簡單地說，跨國國家模式是一種國家間的合作模式，即貝克不再認同傳統的民族國家概念，然而跨國國家模式還是肯定國家概念 (Beck, 1997; 孫治本, 民 88:80)。換句話說，即是國家只作為一種功能架構，而不再俱有民族的意涵。這是因為在全球地方化時代，認同問題已複雜化、多元化；認同尤其不再受限於國家疆域，甚至已將其引導到一個「地球村」的概念，並以環保組織、互助的非營利團體、跨國集團來取代傳統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認同。

我們要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全球化雖然不一定會為人類帶來美麗的新未來，但把它阻擋於國界之外，則必然會立刻帶來貧窮與落後。如何能使全球化作為人類的新機會，而非可怕的陷阱，學者主張，在經濟勢力得以任意跨國運作的今天，必須讓政治也能跨國運作，發揮規範全球資本主義的作用。當然，其他非單一民族國家所能解決的跨國問題，如環境問題、跨國犯罪等，也可能藉跨國政治的建立而獲得較好的處理；換言之，全球資本主義、環境污染的全球化等所引起的問題，已非民族國家和傳統國際組織的政治力所能處理，「跨國政治組織」或貝克所稱的「跨國國家」，因此有建立的必要。普世性的跨國政治組織目前尚不存在，但區域性的跨國政治組織，已有歐盟作為最佳典範。歐盟最重要的特色，在於它不只是出於功能上的考慮，還需有共同的認同；不僅是成員國間的「主權分享」，也是「認同分享」(孫治本, 2001:187)。今天的歐盟，正在發展成為一個超越傳統民族主權國家的新型國家，而這種新型國家認同的教育，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不僅提供了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未來發展的方向，更提供了兩岸認同問題解決的新思維。

概括而言，兩岸關係的錯綜複雜，除了夾雜著歷史的恩怨、民族的使命、經濟的誘因、政治的排他、制度的差異、人民的情緒和強權的利益之外，同時它在今日也受

到了全球化潮流的衝擊。因此，本文贊同學者們提出的以「兩岸治理」⁴來取代兩岸目前在統、獨及維持現狀等三種都是基於「統治」觀點所作的思考。而隨著全球化腳步的日漸加速，兩岸也越來越無法只是從兩岸的角度去思考兩岸關係。大多的國際行為者都介入了兩岸關係的互動，「兩岸治理」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其目的也在於希望兩岸能夠在全球化互動的世界中，能夠在統獨問題還沒有解決以前，就已經可以相互攜手合作，共同治理兩岸中國人的相關事務，不止加深了彼此善意的重疊認同，也加強了兩岸共同因應全球化的挑戰（張亞中，2003：261-292）。然而，「兩岸治理」迄今尚未建立，其根源乃是中共在對台的政治向度上，依舊堅持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的立場，不願往符合全球化潮流的互賴主權方向轉折；再加上目前中共「仍不願放棄武力犯台，進而使兩岸關係網絡無法真正建構解決爭端的機制」。由於以上兩大因素，「使得兩岸關係雖然出現包括企業、非政府組織在內的民間社會各種力量共同投入參與的治理格局」，「但雙方的國家機器卻一直按由上至下的權威行使的統治方式來面對兩岸關係」（李英明，2002：168），因而並沒有形成完全的治理格局。呷込

最後，我們認為，為了因應兩岸關係目前的狀態，中共的國家主權有必要經過再詮釋，進一步向人民主權的向度轉折，讓主權的焦點從政府轉向人民；也就是說，「主權若要受到尊重，必須讓國家是政治實體內部的人民有機會去遂行他們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對兩岸而言，主權如果能往人民主權的向度來論述，那麼兩岸的互賴結構才能轉化為更加積極正面的結果；同時，通過這種人民主權的論述轉折，也才能使兩岸不完全的治理結構轉化成真正完全的治理格局。因為「在這種主權論述之下，市民社會才會真正取得參與兩岸關係運作的正當地位，從而使兩岸關係呈現國家和市民社會共同操作的多行動主體的網路結構」（李英明，2002：170）。另值得一提的是，兩岸的政府雖在政治上缺乏善意互動，但兩岸的人民同樣是接受了儒家文化的傳承，有著相同的民間信仰，在生活倫理上也沒有因為五十多年的隔閡而有根本性的改變。因此，

⁴ 關於「兩岸治理」的概念，國內學者如張亞中、李英明在其著作中都提到過。張亞中進而提出「第三主體」（the third subject）和「整個中國」（chian as a whole/whole china）的概念。「第三主體」所代表的是指「整個中國」（台灣加上中國大陸）的含義，它象徵著擁有兩岸某些主權的讓渡，在意理上，它使得「整個中國」不會是一個「虛」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個「實」的法律實體。當前「兩岸一席」是中共當局的主張，「兩岸兩席」則是台灣方面的期望；無論是「兩岸一席」或「兩岸兩席」，都是一種「統治」權的申述。因此，「兩岸三席」才是兩岸可以積極思考的一個方向，它不再是讓「統治」的「排他性」概念主導著兩岸在國際間的行為，而是以一種共同參與的「治理」觀點來面對在國際間的參與。請參閱張亞中，兩岸統合論（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頁351-356。

兩岸有形成「兩岸公民社會」的條件，問題乃在於，兩岸是否有意願推動一個「兩岸治理」的機制，並進行重構兩岸間重疊認同、尊重多元主體的公民教育工作，讓「兩岸公民社會」能夠逐漸架構完成，使「兩岸治理」成為「兩岸善治」，如此未來兩岸的發展與中國前途，才是真正以兩岸所有人民的意願及福祉為基礎。是以，中共若欲追求兩岸統合與多重認同主體的早日建立，就該讓中國大陸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進一步迎向後民族主義的挑戰。吁

第二節 展望——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轉型

據本文的研究發現，後殖民主義較後現代主義更能適用於中國大陸教育的研究。筆者認為，後殖民主義對中國大陸教育的啟示有三：其一，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重建主體性教育；其二，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喚醒人文精神教育；其三，後殖民主義教育即為形塑公民社會教育。對於如何展望中國大陸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之轉型，我們以為中共可以站在後殖民主義的角度，從事下列三項有利於愛國主義教育的理論工作：(一) 全球化時代，宜用公民教育代替愛國主義教育；(二) 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公共領域，讓傳統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三) 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思維與作為。茲分別敘述如下：

壹 全球化時代宜用公民教育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

正如大陸學者李萍、鍾明華所指出的，二十世紀末以來，公民教育在中國大陸悄然興起，這不僅表達了社會變革與發展對現代教育的要求，而且標誌著各級學校德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改革的歷史性轉型（李萍，鍾明華，2002：66）。因此，中共當局應在此時適應時代的潮流，用公民教育的概念來代替愛國主義教育的概念，以下筆者從這兩個概念的意義、範圍與時代背景加以析論：

（一）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基本上是一種本質化的意識型態教育，而非如公民教育是要培養學生成為具有「思考、批判、參與」能力的健全公民。長期以來，中共把公民教育簡單地與資本主義性質聯繫起來，在其出版書刊中，將「公民教育」看成是「資本主義國家為訓練資產階級政治需要而進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僅僅從這個意義

來理解公民教育，當然它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專利，中共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與之劃清界限；這種認識顯然是有片面性的，這也是中共一直是以愛國主義教育的概念代替公民教育概念的真正原因。有學者認為，「公民」作為西方文明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西方每逢社會劇變、面臨轉型挑戰時的重要議題之一，歷來西方重要學者如亞里士多德、阿奎那、霍布斯、洛克、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等人，也多曾藉著公民以及公民公、私生活的探討與重建，用以修正相關的政治、經濟理論，並對西方社會產生重大影響（趙素娟，2000：6）。從根本上說，公民教育關係國家安危、社會榮枯，至深且鉅，其實成效為何，直接影響到下一代公民對國家觀念之認同與個人權利義務之分辨，進而影響到政治參與的態度與關心，以及民主法治信念的培養與建立。因此，加強實施公民教育，乃是當前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重要課題。

（二）從基本內容來看，公民教育比愛國主義教育的範圍還要廣大。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旨在培養受教育者熱愛祖國思想和情感，立志為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貢獻力量的教育。其內容包括：熱愛國旗、國徽、國歌和首都；學習祖國英雄、模範人物的先進思想和優秀事跡；熱愛祖國大好河山和家鄉；熱愛祖國歷史和優秀文化傳統；熱愛各民族人民和人民解放軍；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熱愛中國共產黨等（顧明遠主編，1991：1）。與之相比，公民教育的宗旨是：使學生認識個人作為公民與家庭、鄰里社會、地區社會、民族國家以至世界的關係，培養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從而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產生歸屬感，並為改善社會、國家及世界做出貢獻；使學生認識自己的民族國家的特色，了解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與法治精神的重要，並在生活中實踐出來；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的素質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他們用客觀的態度去分析社會及政治問題，並能做出合理的判斷（香港教育署編，1996：6-8）。上述兩者的主要區別是：愛國主義教育強調個人對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的效忠與責任，公民教育是以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為基礎，去理解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和責任；愛國主義教育包括了執政黨的政治傾向、主張和價值取向，公民教育則以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的要求為基本取向；愛國主義教育的核心內容是民族精神的教育，而公民教育包括了民族精神教育和民主人權教育。

（三）相對於愛國主義教育的公民教育，已跨越了民族國家時代，更符合全球化時代的潮流。愛國主義教育是民族國家時代的產物，公民教育雖源自於民族國家的時

代，但也包括了具有後民族國家思維的全球化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非洲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這些新興國家的疆域大都與原來殖民地的疆域一致，境內族群或部落相當紛雜。國家建立後，統治精英以國家力量，致力整合境內不同族群的人民成為一個民族，有些學者便稱此為「官方民族主義」(Seton-Watson, 1977: 148)。所謂官方民族主義，正是中共所稱的「愛國主義」。現代國家對人民的控制日深越加需要人民高度忠誠，因此便透過愛國主義教育來加強國民對國家的認同。而今在全球化架構下，傳統的民族國家主體受到挑戰與質疑，現代教育或愛國主義教育，企圖建立的系統化、一體化教育價值論述更被消解於無形，「東西方長久以來被視為二元對立的認知圖像，也被特殊和普遍現象的共生發展概念取代而轉換成一種辯證共生的關係」。整個世界圖像的認知與建構不能再依循傳統的民族國家思維來找到答案，「一種辯證的世界觀、歷史觀、發展觀成為全球化時代下讓我們重新尋得自我定位與認同的新邏輯」(李英明, 2003: vii)。換言之，今日的公民教育，要求我們必須以後民族國家的思維來看待受教育者在全球化時代的處境與位置，即公民教育的範圍應擴及於全球，將全球視為休戚與共的共同社區，這才是面對全球化時代公民教育應有的趨勢。

所以，中共如果要讓中國轉化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應努力於下列三方面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改革的工作：首先，必須跨越中國人這種以血緣關係為主軸的社會理念，讓人與人的關係不再只是根據血緣或民族的關係來界定，而是應該從這種傳統身分的隸屬關係中抽離出來，把自己變成一個社會人、政治人、甚至是法律人。如此，才能真正參與許多的公共事務，才能體認到做為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成員公民的權利義務。其次，中國人缺乏「公共性格」的認知，乃是因為太過於依附在「家族」或「宗族」的關係網絡中所形成的封閉心態，一方面使得中國人缺乏「家族」以外的人際關係經驗與概念，另一方面則又把「家族」的概念過度的擴大到所有的社會關係上。因此，走出「私」家族血緣關係，迎向公民生活「公」的公民意識，今後，如何加強中國人「公」的精神，培育人民具公共精神的公民意識，將是中國大陸社會應急切需要致力改革的重點。再次，中共的思想政治教育，因過度強調「思想一元」、「政治無所不在」的本質，往往陷於僵化的窠臼，與歐美強調「思想多元」、「批判反省」的公民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公民教育已著重於「公民資質」(citizen ship) 的培養，並著重於「知識與文化素養」、「民主素養與公民價值」及「社會參與的技能」等主題上。目前中共要

與世界接軌，參與國際社會活動，而其教育內容是否具有世界觀與前瞻性，值得斟酌；而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否能培養青少年具有宏觀理念、國際視野之「公民資質」的世界公民，更有待評估。

貳 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公共領域才能轉型至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

中國大陸公民教育的興起，之所以標誌著傳統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歷史性轉型，並不是以人的主觀意志和願望為轉移的，而是以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社會文明制度形態的轉型為前提和條件的。從私民、臣民、國民、人民到公民，絕不是概念符號的簡單替換，事實上，公民地位的確認、公民意識的確立是公民社會建立的前提和基礎，正如學者指出的：「公民社會存在的大前提，是要具備一個共同體的社會實體和成員意識，只有滿足了這個大前提之後，相對於現代國家機器的所謂公民社會才有意義，才有歷史的真實性，否則只是空談而已。」（劉國強、李瑞金編，1996：242-243）同時，這種「確認」和「意識」從根本上說又是社會變革的結果。換言之，社會轉型是愛國主義教育轉型的基礎，是公民教育成為可能的前提。

論者以為自一九八〇年代以後，中國大陸已出現了「第二社會」現象。換言之，國家稍一放鬆對社會的嚴格控制和干預，社會便立即尋找國家相對忽略與干預較弱的場域，如時裝、流行音樂等；同樣地，「第二經濟」也會漸趨重要⁵。自八九民運的起源分析，中國大陸社會已具備相當的獨立自主意識，當時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贊成民主化，認為關鍵在於經濟社會化，削弱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蘇紹智等，1992：101）；加上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民間組織⁶正在形成與發展，這一切均表示市民社會現象在中國大陸雖仍薄弱，但市民社會的重要性日增。不過，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弱化極權

⁵ 第二社會是指在中國大陸指令性計畫體制之外的社會；第二經濟是指不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部門工作的人，合法或非法地通過經濟的活動而獲得收入的行為。請參閱李英明，現階段大陸政經社會發展與兩岸關係（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83年），頁62-63。

⁶ 作為民間組織，必須具備非政府性、自主性、志願性等普遍特徵，這是中國大陸的民間組織與西方國家的民間組織相同的地方，但不同之處，亦即中國大陸的民間組織具下列獨特的幾個特徵：第一，中國大陸的民間組織正在形成中，具有某種過渡性。與西方國家相比，它還不成熟，其典型特徵如自主性、志願性、非政府性等，還不十分明顯。第二，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民間組織，是由政府創建並受政府的主導，尤其是那些經過合法登記的有重要影響的民間組織，如各種行業組織、同業組織、研究團體、利益團體等。第三，與上述第一個特徵相適應，中國大陸的民間組織，還極不規範，雖然一九九八年中共民政部修訂頒佈了試圖規範民間組織的新管理條例，但這一規範過程才剛起步，要充分貫徹執行，還有相當的路程。以上請參見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7年秋季號（總第27期），頁112-113。

國家能力的水平上，而應進一步思考如何重建國家與社會的合理關係：即一方面既不能使國家因為有能力干預和介入社會，使社會國家化，另一方面也不能使社會團體完全包攬操控國家，使國家社會化，而為了避免這兩極端產生，中共必須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公共領域。這裡，所謂民主公共領域，是指透過公民教育讓中國大陸人民知道和擁有可以公開討論公共事務和公眾福利的機制，而其討論不是訴諸於社會地位或傳統權威，而是訴諸於理性。以此作為基礎進而要求朝每個成員都享有國家無權侵犯的基本人權和影響國家政策過程參與權的社會邁進，這種社會即可稱之為「公民社會」，而這種社會正是我們在反思中國大陸教育和公民教育時所最期望形塑的社會。

在全球化時代，中共若想在中國大陸建立公民社會和公民教育理論，不應再是國家民族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而應是奠基於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之上。所謂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即是從後殖民主義教育的視角出發，不但要超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二元對立，同時更要以中國大陸所缺乏的自由主義理論與精神重新詮釋民族主義意義的教育理論。對一個現代社會而言，強調公民對國家認同固然是相當重要的教育要務，但社會的組成是否能以公民身分的原則、社會成員相互對待的方式能否符合自由、平等、正義的普遍標準，也都是民主社會中不可忽視的教育工作。然而要在傳統民族主義的基礎上，達成這些屬於公民社會的教育目標，卻有其內在的限制。事實上，正是由於這兩項工作極為重要，而自由主義對中國大陸建立公民社會和公民教育才一直保持特殊的意義。後殖民主義教育一方面強調現代思想和體制是西方向非西方國家擴張和施行文化霸權的意識型態，一方面卻又得依賴於現代思想和體制來造就公民社會的理想以及批判自己國家社會的體制和環境。因此，後殖民主義教育者除了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理論為其國家形塑公民社會和公民教育外，更須從實際出發多方位地考量現代自由主義的價值，絕對不可以因為現代自由主義與西方的關係而否定它。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所要形塑的公民社會，並非全然是目前中國大陸正在出現的「市民社會」。正如哈伯馬斯的分析，今日所謂的公民社會，其意義有別於黑格爾傳統下需求體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商品交換形態的市民社會，甚至於它不包括控制勞動、資本與貨物市場的經濟。公民社會的核心在於是一個集合，這個集合體把為了公共利益而作的論辯過程置諸安排下的公共領域作一種制度化的處理。公民資格因而並不由其所屬的國家或社群來作決定。公民的地位之建立並非全然取決於

其為某國家或社群的一分子而已，更是取決於其民主的權力，透過民主權力的行使，個體得以主動積極的參與公共決策的論辯過程，一以提升自己實質的法律地位，再者也使自己的理性考慮與需求融入公共決策過程，俾能改善公共決策品質，使公共決策更能兼容並蓄，兼顧社群中所有成員的共同利益 (Habermas, 1992: 443)。此外，為了形成一個生氣蓬勃、活力充沛的公民社會，須先營造一個自由而開放的政治文化及其相應的社會化模式，這樣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化模式須能保證「私人領域」不受有意或無意的侵犯 (楊深坑, 民 86: 106)。質言之，健全的公民社會，須賴合宜的公民教育來助長成熟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使個體涵泳其中，不致於受限於某一團體紀律或意識型態的控制，而影響其健全人格的發展。

基於以上對民主的公共領域、公民社會和公民教育之建立已有所認識後，那麼，中共又如何將傳統民族主義轉化為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這也正是目前中國大陸建立合理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應有的取向：第一，在對外關係上，中共需要遏制非理性的階級民族主義情緒，即傳統的排外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完全遏制人民的愛國情緒。問題是要努力使民族主權制度化，在國際事務中提倡國家利益；總歸一句話：要建立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同時也要體認到，民族主權獨立和經濟上的互相依賴並不總是矛盾的。如果一味地強調主權獨立，強調和經濟全球化的消極方面，持續增長可能會成為問題。因此，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就是主張兼顧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立足於自己國家的民主和富強，通過對話和談判，在相互妥協中促進和實現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同時也主張兼顧人類未來前途和各國家的現實利益，在保證各國家、最優先的是經濟和文化落後的地區，實現其自身綜合發展的基礎上 (王鵬令, 1997: 126-127)，通過國家和國家間的協調而有效地解決生態、人口、糧食、能源和環境等關乎人類未來命運的一系列全球化問題。

第二，國家主權的最終歸結點在內政，特別是解決國家和社會關係問題的關鍵，乃在如何實現人民或民主主權。中國大陸人民或民主主權的實現，當務之急是個人人權的法律保障。中共真要落實人權，特別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必須要開放黨禁，結束一黨專政。中共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在中共以黨代政的政治體制下，只規範國家權力而沒有規範黨政關係，使黨大於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公民的政治參與權；這是政治參與的主動形式之一，即組黨結社、集

會自由。中共現在仍然堅持一黨專政，以黨代國，以黨代政，黨同伐異，近年來又兀自對各地依法申請組黨結社予以封殺，且極力加強箝制言論和思想自由，這樣又如何能進入憲政的法治？而沒有憲政，又那裡談得上人民或民主主權落實呢？同時，中共現行立法和司法被置於「黨的領導」和部門強勢之下，部門立法、行政立法合一、司法腐敗、行政坐大，最後形成國家權力不受制約，民眾權利受到侵犯，導致嚴重的政治腐敗和權力專橫，不做出制衡性的制度安排和改革，一切保障都是空談（黃寬裕，民 89：95）。是以，實現憲政愛國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就能在中國大陸培養開放社會的公民民主，這樣也才能為中共政權取得新的合法性基礎。

第三，就台海兩岸而言，中共當局應該深思：「威嚇」不能「建立民族感情」，「武力」不能「解放理性」，只有「民主的機制」、「平等的對話」才是解決問題唯一的途徑。畢竟「和平」要比「統一」、「獨立」或是「面子」都更重要，而「人」的「理性文明」卻是和平唯一的保障。這是兩岸政治上應該努力的方向，真正建立起「民主機制」來替代「威權體制」。誠如英國社會學大師紀登斯（A. Giddens）所說的，在可見的未來，國家仍扮演重要角色。現在，國家的角色本質上不再由「冷戰」來定義，而是如何重新創造文化認同、如何和其他國家發生關係以及如何看待世界，而且主權不再如過去絕對單一化，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混合主權」。北愛爾蘭的和平進程便是一例，它依賴多重主權，如今在新的和平協議下，北愛不管內外，它同時與愛爾蘭、英國、歐盟以及其本身的自治議會政府發生聯絡，它的身分變得更普遍；同樣的，這個觀念也可以用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問題的解決上，或可透過某種彼此接受，創造共同的地位，其他國家的確需要台海兩岸來調解這個問題（Giddens，黃瑞祺編，民 2005：83）。換言之，台海兩岸的政治應建立在人民或民主主權基礎上，透過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及其公民教育創造新的和平秩序，而不要再次陷入戰爭。若有此種人民或民主主權的認知與作法，那麼傳統的國家主權及其領土完整的絕對界限，就已顯得無太大的意義了。

參 面對全球化應有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思維和作為

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其他亞洲國家的領導人，在調整他們的國家戰略時，都感到必須考慮中國因素。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居世界首位。實際上，就亞洲國家來說，中國的崛起比冷戰的結束在某種程度上對東亞國際關係發生著更大

的影響。美日和東亞國家國際關係戰略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國內發展而言的（鄭永年，1998：251）。然而，中國的戰略是如何？毋庸置疑，中國戰爭與和平的意圖必然對亞洲國際關係的格局發生很大的影響；所以，亞洲的戰爭與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當局如何把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理論的民族主義進一步轉化至後民族主義的議程。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上台後，提出「和平崛起」乃至「和平發展」⁷作為中共外交的戰略目標，並對國際社會宣傳推廣。過去中共外交戰略的擬訂是以評估國際與國內形勢為主，策略上亦以統戰結盟為重，對於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並無信心，從未發現本身國力即可作為外交資源，以實力作為塑造有利於本身國際形勢的籌碼。鄧後的胡錦濤時期，在外交方面展現與過去極為不同的風格，較過去活躍積極，不論是在睦鄰外交、多邊外交方面，中共皆扮演區域強權角色，與過去以「韜光養晦」為主軸的外交模式有明顯差別。現階段中共的外交極力以經貿實力作為外交籌碼，以「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作為達成崛起目標的策略，亦即充分利用本身的實力，建立所謂的和平與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爭取國際認同。是以，當我們站在國際戰略格局上，便可具體觀察到中共以「和平發展」作為回應全球化時代的挑戰。

當然，每一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時代的教育，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審視當代中國大陸教育的基本維度：一方面，它可以啟動我們已有的關於教育的知識儲備，從一個新的視域思考中國大陸教育的未來走向；另一方面，這種努力將使中國大陸的教育學具備真正的時代特色和時代精神。「歷史已然說明，中國二十世紀中對現代化的延宕，已經造成了重要的民族生存問題的根本癥結，如今，只有在全球化語境中確實地從事自身的現代化建設，才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策略，成為新世紀中國形象重新書寫的基本保證」（王岳川，2001：202）。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來，由於全球範圍內人們頻繁的跨國遷移、流動，使得公民的定位在全球化背景中超越了傳統的國家定位，對民族國家的權威、認同構成了挑戰。所以，我們必須從「全球化

⁷ 有「國師」之稱的「中國改革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在二〇〇三年首度提出「和平崛起」的說法，但此一說法屢遭詬難，中共近期已改以「和平發展」取代。因為，「崛起」指在很短的時間內，實力一下子有很大的膨脹，但鄧小平提出的改革理念卻是漸進的，根本不是一條「崛起」路線。在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兩年間，胡錦濤、溫家寶都曾在講話中提出「和平崛起」，但近年此一說法已經淡出中共官方而改倡「和平發展」的話語體系。以上請參閱蔡瑋，「中共和平發展對兩岸關係的戰略意涵」，蔡瑋主編，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94年），頁8-14。

／本土化」的視野重新審視公民與公民教育問題⁸。基於此，我們可以說，所謂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其實就是全球化時代公民教育的一部份。其主要意涵與範圍包括：它展現了「憲政愛國主義」的教育意義、它凸顯了「文化多元主義」的教育內涵和它具備了「公民世界主義」的教育理想，這就構成了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的真諦。依筆者的淺見，全球化時代的公民教育，應包括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與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而反觀目前中國大陸教育僅侷限於前者的強化與調整，對於後者的教育目標與教育內容，恐怕是今後亟待思考與加強的重要課題。

首先，在「憲政愛國主義」的教育意義方面。我們要知道，「憲政愛國主義」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伯馬斯的憲政觀中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它們也是構成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兩個重要的理念。前者要解決現代國家統一的價值規範問題，後者則是不但能夠置換民族性並賦予價值規範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認同標準，而且能夠連接公民的動機和態度，從而保證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穩定支持的動力資源(應奇,2003:186)。哈伯馬斯為了符應全球化浪潮提出的對策乃是「憲政愛國主義」，他說：「雖然民族主義曾經是民族國家成功發展的動力，但是現在民族國家卻必須堅決捨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曖昧性格。……民主的公民身分必須扮演比法律地位更大的角色，它必須成為共同政治文化的焦點。」(Habermas, 1996b: 132-133) 換言之，哈伯馬斯是要我們以基本人權、民主憲政為國民凝聚向心力的焦點，這樣的愛國主義需要的不是特定民族歷史文化的支撐，而是指所有能培養公民德性的政治文化，諸如理性、妥協、溝通、寬容等。哈伯馬斯又說：「多元文化社會的國家(如瑞士和美國)證明了培養憲政原則所需要的政治文化，並不要求所有公民分享相同的語言、族群或文化根源。相反，政治文化本身就可以作為憲政愛國主義的共同基礎。這種愛國主義同時強化了我們的信念，讓我們知道雖然多元文化社會中有許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卻可以並行不悖，維持

⁸ 不過，全球化所引起的跨國的全球性問題，除了對民族國家構成了挑戰外，也導致了一股「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現象的興起。赫爾德(David Held)等人在其著作《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認為，「全球化是一個不平衡的歷史進程，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等級和不平等，也滋生著新的控制關係和差距。而這些新舊問題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有可能激化，成為顛覆全球化進程的力量」。正是由於這些矛盾和衝突，等級和不平等，使全球化在推進的過程中觸動了民族國家的傳統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和人們的習俗與觀念，從而引起了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碰撞與磨擦，其後果是反全球化力量在世界各國的滋生和蔓延。其原因各異，人員龐雜，除了環保主義者、邊緣化人群、原先的受保護行業從業者、一些特殊的工作人群外，還有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就是民族主義者。因此，全球化時代公民教育，既是世界公民的教育，同時也應是國家公民的教育。以上請參閱：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London: Polity Press, 1999), P. 42.

同異並存的局面。」(Habermas, 1992: 7) 是故, 哈伯馬斯針對任一特定國家安頓多元文化族群的建議, 基本上是立足於自由主義對政治共同體屬性的理解。根據此一見解, 族群因素與歷史文化因素必須讓步於憲政民主制度, 愛國主義教育即可建立在這種抽象普遍的理念之上, 而其制度性落實則應保存了個別國家特殊主義的一面, 這也正是我們所說的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之意義所在。

其次, 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教育內涵方面。所謂「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 乃是指對於社會上所存在的不同文化群體, 主張尊重其自主性, 包容其差異性, 使他們都能並存且不相悖。因為, 每個不同群體所代表的文化, 無論強弱興衰, 都有其一定的價值, 他們若能彼此尊重、相互欣賞乃至學習, 則人類文明必可迅速獲得擴展與提升 (Belle & Ward, 1994: 29-50)。在文化多元主義的理念引導下, 所謂「多元文化教育」便這樣興起了。根據學者 (黃政傑, 民 82; 沈六, 民 82) 的看法, 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有三 (一) 反種族主義, 亦即反對種族偏見、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 因為這些觀念和行為完全是違背文化多元主義的, 而多元文化教育則在培養對異文化或次文化的接觸與瞭解, 使社會上各群體能相互尊重、包容、欣賞與學習。(二) 機會均等。也就是說, 無論性別、年齡、種族、語言、宗教、階級等, 都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機會。(三) 瞭解各群體的文化背景。透過教育的途徑, 使學生瞭解不同群體的文化特質, 與其文化內涵的複雜性, 進而培養其尊重各群體文化的正確態度 (中國教育學會主編, 民 82: 28-30、54-56; Timm, 1996: 1-6)。總之, 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 國際社會最突出的問題是全球化與文化衝突, 如何才能使未來的公民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國際社會, 這是全球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柯根 (J. A. Cogan) 和德里克特 (P. C. Derricott) 對世界許多國家的學者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調查, 根據調查結果, 他們提出了二十一世紀的公民應該具備四方面的公民資質: 一是個人維度, 即促進和提高公民倫理的個人能力; 二是社會維度, 即強調在不同文化背景中, 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 共同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 三是空間維度, 即公民在全球化的背景中, 合理地解決族群、國家和世界問題的能力; 四是時間維度, 即公民能夠把歷史傳統與未來的發展結合起來, 解決當前面臨的公民問題 (轉引自萬明鋼, 2004: 23)。這四方面的公民資質, 其實是來自多元文化取向的公民教育觀, 它整合了自由主義, 公民共和主義和社群主義等的公民教育思想, 提出了二十一世紀對公民與

公民教育的基本要求。

再次，在「公民世界主義」的教育理想方面。哈伯馬斯之所以能夠超越民族主義者所珍視的歷史領土，仍然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有關。自由主義者眼中具有普遍人權、正義公理、民主憲政，這些目標或德性在本質上都已跨越血緣、階級、性別等藩籬，具有全球一體適用的特性。事實上，西方從啟蒙以來，自由主義者就相信人性共通，只要加以適宜的教育，就能充分發揮理性，掃除一切迷信無知，追求文明的進步生活。現實中國家疆域的存在雖然標示了各地發展或有快慢，但國界並不能構成全人類徹底解放的障礙。另一方面，今日的世界由於交通工具和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人與人間的有形距離愈來愈近，世界變得愈來愈小。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的「地球村」社區，並非因政治或意識型態而結合，而是超越國界和領土主權，因全球的互賴關係而形成的世界社區（楊國賜，民 74：3），可以說是對現代世界一個十分貼切的描述。因此，今天世界各國所進行的公民教育，不能再侷限於自己的國家，除了培養健全的國民以外，尚需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世界公民。基於此，中國大陸應如何實現「世界社區」和「世界公民」的理想呢？（一）繼續加大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國際合作，積極發揮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全球治理已經是國際社會的一種實際需要，是目前唯一可抗衡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現實選擇。倡導一種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國際社會的道義力量所在。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應當在全球治理中主動肩負更多的道義責任。（二）培育與全球化要求相適應的國家認同。要將愛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分開來，愛國主義的基礎雖是國家利益，但國家利益與公民的個體利益及人類的普遍利益並不是二元對立的，從根本上說，它們應當是統一的。所以，熱愛國家並不必然排斥追求正當的個人利益和超越國家的人類利益（俞可平，2005：67-68）。（三）要認識到在全球公民社會中，公民權利必須越過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各國政府，並將這種權利落實到作為個人的法律主體的頭上，並使個人享有不可剝奪的自由、平等的權利（Nussbaum，1996：14）。換言之，後民族主義的公民教育，即是實現「世界社區」和「世界公民」理想的重要途徑，它應多強化世界公民的理念，而超越國籍，擴及所有人權理念及國際責任。

最後，我們要再次指出，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是站在後殖民主義的角度，超越普遍主義／特殊主義、世界主義／國家認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的

舊思維，走向後民族主義新思維的愛國主義教育。因為如果我們只重視「普遍主義」與「世界主義」的論述很容易落入空想的「烏托邦主義」，而解釋掉人與國家社會的個別差異性；相反地，如果只偏重「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的論述也很容易趨向膠著於集體式、社群式的封閉思維，一方面以國家與文化主體的特異性，解釋掉人與人、社群與社群得以彼此以「文明作風」(civility) 相互交往，溝通的道德倫理原則與理念，另一方面，為凸顯單一個體的差異性，而對別的国家社會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與論述（蔡英文，民 86：75）。換句話說，後殖民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就是要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兩者之間求妥協，在族群文化與自由民主制度之間求平衡，對現今的中國大陸而言，這個平衡點似乎比較靠近自由主義這一端。也就是說，一個合理而又可行的愛國主義教育理論，應當以尊重個人自主自立的自由主義為基礎，然後，在上面添加一些民族情感與文化歸屬；而不是先以民族文化的集體認同為基礎，再去移植自由民主體制的原則。所以，後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不僅要使其受教育者能夠成為國家公民，同時也要在包括國家認同在內的多元認同主體的基礎上使其受教育者成為世界公民。而這種世界公民之素養，必須跳脫傳統的以國家中心為基礎、且強調個人與單一國家之對應關係的狹隘觀點，而代之以宏觀的全球視野，體認世界各國相互依存的關係，進而培養世界公民所需具備的民主素養與各項解決問題的能力，方能善盡世界公民的責任。